

2017 年 11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Nov. 2017

第 6 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 6

埃及研究

当代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与工业化问题评析^{*}

毕健康 陈 勇

摘要：工业化与国内劳工移民密切关联，相互促进。埃及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拉动了农村劳工向城市大规模移民。劳工移民在实现部门和地域转移的同时，推动了埃及工业化进程。纳赛尔时期是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黄金时期，劳工移民数量迅速增长、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埃及劳工移民的绝对数量增长极其缓慢，国内劳工移民率下降；劳工移民陷入职业地位和财产收入难以提升的困境，向上的社会流动也不断受阻。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工业化停滞不前和过度城市化，劳工移民教育水平的低下亦是重要诱因。

关键词：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工业化；城市化

作者简介：毕健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10）；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 2016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71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7)06-0003-16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当代埃及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工业化是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对国家发展战略形成共识,即“不是应否实现工业化,而是应以何种形式实现。”^①工业化的本质是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从量的扩张上看,工业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质的变化上看,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将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成功转换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②。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一再表明,工业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移民。劳工移民实现了就业部门和地域的重新分配,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工业化。劳工移民亦是人口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及人口已近9,480万,^③国内移民率一度达到10%。^④因此,劳工移民渠道是否顺畅,将直接影响埃及人口红利的实现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近代埃及一直是落后的农业国。1952年“七月革命”后,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开始竭力推动工业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埃及初步成为准工业国,其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27%,符合同期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和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25%的准工业国标准。^⑤埃及的工业化带动了大批农村劳工移民城市,劳工移民也反过来促进了埃及的工业化发展。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工业化的失败,城乡发展不平衡,同时受劳工家庭背景和自身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增长极其缓慢。与此同时,劳工移民陷入职业地位和财产收入难以提升的困境。因此,本文在扼要梳理工业化与国内劳工移民关系的基础上,着重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劳工移民的困境及其成因。

一、劳工移民与工业化的关系

劳工移民是指为了工作或出于改善生活需求,由出生地转移到居住地的劳工。劳工移民类型多样,按是否跨越国境线为界,劳工移民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按移民时间长短,分为短期移民和长期移民。其中,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循环式移民,

① [美]霍利斯·钱纳里、谢尔曼·鲁滨逊、摩西·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② 姜爱林《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研究》载《财贸研究》2004年第3期,第3页。

③ “Total Egyptian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Sex 2017,” Central Agency for Public Mobilization and Statistics, <http://www.capmas.gov.eg/HomePage.aspx>,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10日。

④ Santiago Herrera and Karim Badr, “Internal Migration in Egypt: Levels, Determinants, Wages, and Likelihood of Employ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166, World Bank, August 2012, p. 3,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75681468232465669/pdf/wps6166.pdf>, 登录时间:2017年7月1日。

⑤ [美]霍利斯·钱纳里、谢尔曼·鲁滨逊、摩西·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91页。

即一种短期的、循环的和居住地没有长期转换的移民,这也是目前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主要方式。实际上,劳工移民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国际经验表明,大规模的劳工移民一般发生在工业化进程中。埃及的工业化促使大量劳动力从上埃及农村向下埃及大城市移民。同时,劳工移民也为埃及的工业化提供了人力资源,促进了埃及工业化的发展。

(一) 国内劳工移民和工业化的互动关系

劳工移民与工业化互相影响和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劳工移民的基本动力和加速器。工业化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制造业等非农产业的崛起。由于制造业等工业部门大多聚集在城市地区,城乡发展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农村劳动力在预期收入的驱动下涌入城市非农产业。钱纳里(Hollis Chenery)和赛尔奎因(Moises Syrquin)归纳出了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拉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①与此同时,工业化推动社会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高层次职业数量逐渐增加,整体职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劳工获得社会地位提升的机会更多。与此同时,劳工移民也能够推进城市化进程,为工业化创造发展空间。劳动力的地域、部门转移,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有利于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并促进技术进步和发挥人口比较优势,最终实现工业效率增长,加速工业化进程。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劳工移民规模和速度的变化与工业化进程基本一致,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以英国为例,1760~1870年间,英国进入工业化时期,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大,流动速度较高;19世纪80年代至二战结束,工业发展减速,农业就业比重下降放缓;二战后,由于农业部门加速机械化和集约化以及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农业劳动力的流动速度再次提升。^②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劳工移民与之前的欧美有所不同,即工业化尚未完成,所谓的第三产业就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从中低收入国家来看,在1965~1980年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水平的变化呈正相关关系,但在1980~1997年间,工业化程度相对稳定,城市化率随着非农产业比重(包括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上升而上升,这主要是服务业比重提高的产物。^③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服务业中,存在巨大的非正规就业部门,且生产率低下,导致进入城市的劳工移民难以获得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引发过度城市化

^①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45页。

^② 蒋尉《欧洲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劳动力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③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第46页。

问题。2015 年,埃及的人均年收入达 3,340 美元,^①属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划定的中低收入国家。埃及出现了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劳工移民社会地位提升困难,工业化与劳工移民关系失衡。

探讨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与工业化关系失衡,需深入分析劳工移民的动因。关于劳工移民的动因,学界先后提出了诸如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新迁移理论等主要解释框架。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基于工业化造成的城乡差距,将城乡工资差异或城乡预期工资差异视为移民的动因,是从宏观层面研究劳工移民的主流理论。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主要包括古典两部门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和托塔罗模型。1954 年,刘易斯构建古典两部门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分成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部门。他认为,基于两部门间的边际生产效率和工资差异,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无限供给现代部门。1961 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利用新古典经济学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他们认为,非农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产品的消失而结束,强调了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性。1969 年,托塔罗用预期收入概念替代了农村劳动力的工资驱动分析,而城市和农村的失业率成为影响预期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刘易斯、费景汉、托塔罗等学者提出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二元结构为前提,将城乡的工资差异或预期工资作为影响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主要原因。埃及推行城市主导的工业化政策,城乡差距明显,因此城市预期收入高是埃及移民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难以解释劳工个体移民的具体考量。人力资源理论和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为从微观层面分析劳工移民提供了有力支持。人力资源理论将劳工移民视为一种投资,强调劳工技能(教育、培训和经验)对移民的影响。实证研究证明,劳工移民更可能是“那些年轻、受过较好教育、回返风险较低、更有成就以及在迁移目的地有较多联系的人”^③。1991 年,斯塔克等学者将家庭作为分析劳工移民的基本单位,提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他们认为,家庭可以有效降低劳工的移民成本和风险,同时劳工移民又使家庭收入多元化,有利于消解贫困。斯塔克还提出,农村收入的不平等将引发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促使农村劳工移民城市。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群体庞大,而且具有阶段性差异,其中劳工移民自身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和家庭背景对移民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二) 埃及国内劳工移民运动概览

大规模劳工移民运动肇始于工业化的启动,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

^① “Egypt, Arab Rep.,” *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egypt-arab-rep?view=chart>, 登录时间:2017 年 4 月 10 日。

^② 杨文选、张晓艳《国外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载《经济问题》2007 年 6 期,第 18—21 页;石智雷《国外迁移劳动力回流理论研究述评》,载《人口与发展》2013 年第 1 期,第 29—37 页。

^③ 杨文选、张晓艳《国外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第 20 页。

展,直到工业化或产业结构转型逐步实现,劳工移民规模才随之减少。埃及工业化肇始于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革,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推动了埃及劳工移民运动的产生与发展。1952年“七月革命”以来,当代埃及劳工移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纳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和1981年至今。纳赛尔时期推行城市主导的工业政策,制造业和建筑业集中于开罗等大城市,国内劳工移民规模迅速壮大。196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仅开罗就涌入近118.1万劳工。^①萨达特时期,在私有化政策的刺激下,城市建筑业发展迅速,吸引了众多埃及地区的农村劳工,基于工程项目的循环式迁移逐渐取代了原来基于农业季节的迁移。由此,埃及国内劳工移民进入第二个高潮期,20世纪70年代超过10%的埃及人参与了国内移民。^②

1981年以来,埃及工业化进程严重受挫,国内劳工移民增长极其缓慢,具体表现为国内劳工移民的绝对数量缓慢增长和国内移民率(即移民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一般而言,劳动力规模的持续增长可有力支撑国内移民的扩张,促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当代埃及劳动力的规模增长迅速,1960~2000年间,埃及劳动力从780万增加到1890万,^③2014~2015年达2,120万人。^④但是埃及劳动力规模的持续增长未能促进埃及劳工移民队伍的壮大。1986年人口普查显示,7.5%的埃及人曾参与国内移民,其中仅18.6%的国内移民从埃及农村迁出,而农村移民中又有21.1%选择迁移到其他农村地区。^⑤进入21世纪后,埃及的平均国内移民率仅为8%,同期世界平均国内移民率为15%左右。^⑥2007~2009年间,埃及国内移民率更是下降到4%左右。^⑦

当代埃及国内人口迁移主要包括四种形式:农村向城市移民、城市向农村移民、城市间移民和农村间移民。1976年、1986年和1996年三次人口普查均显示,埃及国内人口迁移规模超过400万。^⑧其中,农村向城市移民在1976年达到高峰,占国内移民总数的24.6%。^⑨具体的人口迁移路径是:从上埃及省份和中埃及省份到下埃

^①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Ph.D. Dissertation, Centr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CDE),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2, p. 28.

^② Ibid.

^③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94.

^④ Central Bank of Egypt, *Annual Report 2014/2015*, p. 55.

^⑤ Khalid I. Aldakhi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Arab Countries: The Case of Egypt*,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Working Paper 9933, 1999, p. 15.

^⑥ Santiago Herrera and Karim Badr, *Internal Migration in Egypt: Levels, Determinants, Wages, and Likelihood of Employment*, pp. 3–4.

^⑦ Ibid., p. 3.

^⑧ Ayman Zohry,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gypt: A Pilot Stud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July 2005, p. 15.

^⑨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p. 29

及省份,从上、下埃及省份到苏伊士运河区,从埃及内地到开罗和亚历山大地区以及从埃及内地到边境地区。上埃及农村地区是主要的外迁地,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是主要接收地。近年来,大开罗地区的边缘农村地区如吉萨省、盖尤比省也接收了大量外来人口,人口快速膨胀。埃及的人口迁移大致反映了劳工移民的情况,劳工移民出于工作目的,主要选择从农村移民到城市。20世纪90年代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在劳动力地域迁移中占比最高,为4.18%,^①原本在上埃及农村工作的劳动力最有可能参与城乡迁移,^②其中产生流动劳动力^③概率最高的地区亦是上埃及地区,其概率为12.46%。^④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政府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积极推动工业化,埃及农村劳工开始大规模移民城市。国内劳工移民给埃及农村劳工带来了职业、财产收入、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改变。劳工移民依靠积蓄资助留守农村的家庭,以缓解贫困。但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城市制造业发展缓慢,正规工商业未能创造足够的新岗位,造成移民城市的绝大多数农村劳工只能在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谋生。国际劳工组织将非正规就业部门定义为家庭服务、非专业劳动者等各种自谋生计的形式以及少于5人或10人的微型企业。^⑤据此定义,1992年,埃及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吸收了40%的非农就业人口,约占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与政府部门吸收的就业人口相近。^⑥非正规就业部门缺少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法律约束,薪酬低,且无保障。与此同时,劳工移民大多难以承担城市高昂的房租,被迫选择聚集在棚户区,生活方式上仍保留着传统的农村宗族习惯,未真正融入到现代城市生活。综上所述,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个体在完成部门和地域转移的同时,却难以实现职业的提升、收入的提高,向上的垂直社会流动日益困难。

埃及劳工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同时,也实现了从农业部门到非农部门就业的转换。但限于教育水平,他们往往只能在城市从事诸如建筑搬运工等非正规工作,导致埃及国内劳工移民难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缺少社会基本保障,职业地位提升困

① Barry McCormick and Jackline Wahba,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the Egyptian Labor Market," *ERF Policy Research Report*, No. 0401, Economic Research for the Arab Countries, 2004, p. 23, <http://erf.org.eg/wp-content/uploads/2016/04/PRR-0401.pdf>, 登录时间:2017年9月1日。

② Ibid., p. 11.

③ 流动劳动力指的是没有固定工作场所的劳动力。

④ Barry McCormick and Jackline Wahba,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the Egyptian Labor Market," p. 19.

⑤ 郑秉文主编《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⑥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 p. 239.

难。埃及劳工移民进入城市后,大致有三种工作类型:合同制工作、日计工作和任务计工作。但事实上,只有少数埃及国内劳工移民有机会获得合同制工作,而绝大多数劳工移民都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按工作天数或具体任务来计算工资。社会调查显示,76%的上埃及劳工在开罗从事日计工作和任务计工作。^①劳工移民在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工作极不稳定,每天的工作时间和每星期的工作天数浮动很大,每天工作时间介于5~18个小时,日均8.5个小时,其中每天超过8小时的占3.3%;每星期的工作天数介于1~7天,平均4.9天,其中每星期工作4天的占比最高,达34.7%。^②埃及城市建筑业的劳工移民的职业同样缺乏稳定性。城市建筑业是埃及劳工移民的主要职业选择之一,调查显示,多达38%大开罗的建筑工人是劳工移民。^③但是,建筑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只雇佣少数正式员工,高达90%的建筑工人没有正式劳动合同,其中70%没有稳定雇主。^④

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工作流动性过强,缺乏社会保障,风险大。以埃及建筑业为例,为逃避政府监管,埃及的建筑公司一般通过小分包商,或是非正规的包工头来雇佣劳工。在埃及,只有极少数分包商和包工头为劳工缴纳社保费,提供社保卡。绝大多数劳工移民一旦遭遇严重工伤,只能送回农村,治疗费用基本自理。与此同时,农村劳工移民到城市后,还要面临更有竞争力的开罗本地居民的竞争,职业地位提升愈加困难。调查显示,迁移到开罗的上埃及劳工中,只有11.8%的劳工有过工作变化,基本上是转移到汽车修理厂工作。^⑤即使在同一行业内,劳工移民也难以完成向高级技工的转变。调查显示,仅有3%的建筑业劳工从无技术劳工向专业技工转变。^⑥因此,在开罗工作的上埃及劳工中,只有25.6%的劳工表示职业地位在开罗获得提升,47.9%的劳工表示维持原状,更有26.4%的劳工表示职业地位下降。^⑦

一般而言,城市非农部门比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因此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收入比居住在农村时有所提高。然而,劳工移民大多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谋生,收入不稳定,且城市生活成本日益高涨。劳工移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相对有限,难

①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p. 136.

② Ayman Zohry, *Unskilled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from Upper Egypt to Cairo*, Centre d'Etude et de Documentation Economiques, Juridiques et Sociales, 2002, p. 16.

③ Heba Handoussa and Gillian Potter, eds., *Employ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Egypt in the 1990s: A Study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1, p. 144.

④ Ragui Assaad,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n Egyp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1, No. 6, 1993, p. 930.

⑤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p. 145.

⑥ Heba Handoussa and Gillian Potter, eds., *Employ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Egypt in the 1990s: A Study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p. 146.

⑦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p. 147.

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回归性分析显示,埃及国内劳工移民收入相比农民要高 4.7%。^①这说明,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收入确实有所提升。具体来看,1980 年上埃及米鲁夫省农业工人每日工资 1.2 埃镑,同期政府雇佣的劳工移民每日工资 0.8 埃镑,如加班能达到 1.6 埃镑;私有部门雇佣的劳工移民工资更高,平均每日 2~6 埃镑。^②不过,劳工移民的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幅度有限。上埃及米努夫省劳工一般每年移民 6 个月,平均每年收入 210 埃镑,而世界银行统计的埃及 1985 年人均年收入为 430 美元。^③由此可见,劳工移民较农村劳工收入有所增长,但如果考虑他们在开罗的生活成本以及这 5 年间的通胀率,^④上埃及劳工移民的实际收入不足埃及城市的本地劳工的一半。

国内劳工移民收入增长不足,同期埃及城市房价和房租高涨,导致劳工移民只能聚集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区,生活条件恶劣。纳赛尔政权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为社会中下层提供大量保障性住房,并严格限制房租上涨。到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转而推行经济自由化,放宽对房地产行业的限制,私人资本开始涌入房地产市场。同时,埃及劳工移民大量涌入开罗、亚历山大两大城市,城市住房需求量大。埃及地价一路攀升,1973~1980 年间,土地均价从每平方米 50 埃镑涨至每平方米 250 埃镑。近年来,开罗市的地价已升至每平方米 1,000~3,000 埃镑,市中心地价已高达每平方米 30,000 埃镑。^⑤国内劳工移民难以负担如此高昂的房价和房租,他们不得不侵占城市周边土地,自建简易的非正规住房,导致城市棚户区迅速扩张。2006 年的调查显示,埃及开罗棚户区的年均人口增长率 2.57%,正式城区则低于 0.4%,棚户区人口已经占开罗总人口的 65.6%。^⑥近年来,棚户区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千米 2,000 人,远超国际平均水平。^⑦棚户区基础设施缺乏,生活条件艰苦,房屋多为窝棚草屋,水电供应不足,卫生和教育条件差。

劳工移民在城市省吃俭用,以资助留守农村的家庭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缓解贫困。同时,他们在进入到城市新环境后,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随之出现变化。部分在城市从事底层工作的劳工移民,认识到受教育程度低是限制自身发展的重要因

① Santiago Herrera and Karim Badr, *Internal Migration in Egypt: Levels, Determinants, Wages, and Likelihood of Employment*, p. 10.

② James Toth, *Rural Labor Movements in Egypt and Their Impact on State, 1961–1992*,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9, p. 29.

③ Ibid.

④ 1986 年 1 埃镑兑换 0.73 美元,考虑 1980~1985 年中间的 5 年时间差和物价变化,可大致估算汇率为 1 美元等于 1 埃镑。

⑤ 刘冰洁《20 世纪 60~80 年代埃及住房问题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15 页。

⑥ The World Bank, *Arab Republic of Egypt: Urban Sector Update*, Report No. 44506-EG, June 2008, p. 11,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9487/411780v10REVIS1Box0327393B01PUBLIC1.pdf?sequence=1&isAllowed=y>, 登录时间: 2017 年 5 月 2 日。

⑦ Ibid., p. 6.

素。因此,他们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具体重视程度随劳工自身文化程度的上升而加强。自身为文盲的劳工移民中,有4.4%的劳工认为男孩应接受教育,13.3%的劳工认为女孩应接受教育,而受到过中专教育的劳工认为男孩和女孩应接受教育的比例均为36.7%。^①但劳工移民在生育偏好和童工使用上依然十分保守。对在开罗的上埃及劳工进行的调查显示,子女数量随着劳工移民的年龄而增加,45~49岁劳工平均有5.6个小孩,高于上埃及地区平均的4.5个,^②且偏爱男孩。此外,使用童工在参与国内移民的劳工家庭更为常见,劳工移民家庭中高达44.3%的男孩和42.2%的女孩曾经有过担任童工的经历。^③

三、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困境的成因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国内劳工移民最强大的拉动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城乡工资差异或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则是劳工移民的主要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埃及劳工移民困境,主要是埃及工业化失败和过度城市化的产物。埃及农村劳工教育水平的低下及其贫寒的家庭背景,则是造成劳工移民困境的重要诱因。

(一) 工业化停滞不前

萨达特执政以来,埃及实际上抛弃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这是导致国内劳工移民困境的根本原因。萨达特时期埃及政府推行的“开放政策”,穆巴拉克时期的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亦即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埃及实际上放弃了工业化,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工业化裹足不前,埃及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的劣势长期固化。所谓的四大支柱产业,即石油出口、侨汇、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极易受到地区局势和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另一方面,具有地区乃至国际竞争力的正规工业部门失去发展动力,造成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大量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直接导致国内劳工移民的困境。

纳赛尔时期是埃及工业化和国内劳工移民的“黄金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纳赛尔政权在经济上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加速工业化进程,引发农村劳工大规模移民城市;在社会制度上,推行“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限制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保护工人和农民权益。在纳赛尔时期,埃及经济高速增长,制造业增长较快。1959~1975年间,埃及采矿业和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5.9%,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4.8%的增长速度。^④埃及工业结构也实现逐步升级,在工业增加值中,基本消费品工

①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p. 199.

② Ibid., p. 190.

③ Ibid., p. 198.

④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 A Labour Market Approach*, p. 32.

业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64.8% 下降到 1966 年的 55.6%; 化工、纸张、金属等中间产品比重的增加引人注目; 机器制造业的比重明显增长, 由 1952 年的 0.7% 上升到 1966 年的 4.4%。^① 埃及逐渐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准工业国。埃及工业化的推进给埃及农村劳工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与此同时, 纳赛尔政权强调阶级合作, 协调劳资关系, 允许工人参加企业分红和管理, 实行社会基本保障制度, 有力地维护了劳工移民的权益。不过, 埃及劳工移民规模超过了城市需求, 过度城市化问题开始凸显。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 埃及放弃了纳赛尔时期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 转而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1974 年, 萨达特实行经济开放政策, 放宽对私人资本的限制, 一厢情愿地试图将埃及的劳动力与阿拉伯世界的资本、西方先进技术相结合, 促进经济发展, 结果适得其反, 反而使埃及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末端。1970 年, 埃及取消对私有财产的监管。1974 年, 埃及颁布《阿拉伯和外国在埃及投资和自由区法》, 向外国资本开放埃及经济, 提供相关保证和特权; 1977 年颁布的第 32 号法律进一步增强了这些保证和特权。^② 外国资本短期内大量涌入, 扰乱了埃及的金融市场, 也造成寻租活动收益远高于生产性活动、消费品大量依靠进口的局面, 或称为“消费性开放”。穆巴拉克时期延续了开放政策, 并于 1991 年和 2004 年先后进行了两次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 以推进经济自由化和发展私有部门。期间, 穆巴拉克政权也曾大声疾呼发展工业, 力图加大对生产领域的投资, 从而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但埃及国内生产部门的改革严重滞后, 未能满足经济开放的外向性要求。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其实质是去制造业化, 直接导致埃及国内制造业萎缩。1959~1975 年间埃及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 17.5% 上升到 20.5%, ^③ 但自萨达特实施经济改革以来, 这个比率一直在 20% 之下徘徊不前,^④ 至 2016 年下降到 15.8%。^⑤ 一方面, 工业生产率难以提高, 埃及工业品在世界市场缺乏竞争力; 另一方面, 地租性经济即侨汇、石油出口、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等易受国际环境影响的行业蓬勃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 埃及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动力之一便是石油业, 1975~1979 年间埃及石油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33.4%。^⑥

① 杨灝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的埃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142 页。

② 田文林《埃及“强国梦”受挫的深层根源》,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1 期, 第 41 页。

③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A Labour Market Approach*, p. 31.

④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 p. 88.

⑤ Central Bank of Egypt, *Annual Report 2015/2016*, p. 117.

⑥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A Labour Market Approach*, p. 32.

通过比较埃及与土耳其的工业化,可以清晰地证明埃及工业化的失败。20世纪70年代,埃及和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能力和出口结构大同小异,1977年工业品出口占两国出口总额的25%。^①与埃及不同,土耳其长期坚持进口替代战略,着力发展民族工业。至2003年,工业品出口已达土耳其出口总额的85%,而埃及的工业品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39%。^②侨汇、石油出口、旅游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则取代工业品出口,成为埃及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手段。1975~2000年间,侨汇、石油出口、旅游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占埃及外汇总收入的64%。^③然而,这四大经济支柱全都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具有寄生性,无法真正提高埃及的社会生产力。自1980年以来埃及全要素生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不断下降,也是埃及工业化失败的具体表现。^④

去制造业化是造成埃及劳工向上社会流动受阻的根本原因。工业发展能够推动产业规模的扩张,增加职业的绝对数量;同时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带动职业结构的高级化。然而,埃及制造业发展不足,工业化进程裹足不前,给埃及劳工移民带来众多不利影响。首先,埃及城市新增就业机会减少,扩大了劳工移民的失业风险,打击了农村劳工参加国内移民的积极性。其次,埃及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大幅上升,农业就业人口比率下降,产业层级提升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如同20世纪末的其它中低收入国家,埃及服务业总体层次低,反而限制了埃及的职业结构高级化。多数国内劳工移民最终进入城市的非正规就业部门,难以获得体面的职业和稳定收入。最后,埃及工业体系不健全,电力、通信、交通等产业薄弱,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造成国内劳工移民居住和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埃及工业化失败反过来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国内劳工移民供给不足。费景汉和拉尼斯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并非无限制地供给城市,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的主要动力。埃及人口与土地的矛盾相当严重,95%的埃及人聚居在仅占国土面积4%的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农村劳动力充沛,农业生产率低下。埃及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59年的31.5%下降到2000年的15%,2012年仅为14.5%。^⑤农业

^① Amr Adly, *Stat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and Egypt in the Post-Liberalization E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4.

^② Ibid.

^③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 p. 126.

^④ Ibid., p. 105.

^⑤ AfDB, OECD, UNDP,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4,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Africa's Industrialization*,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14, p. 5, http://www.africaneconomicoutlook.org/sites/default/files/content-pdf/AEO2014_EN.pdf,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9日。

劳动力占埃及总劳动力的比重也从 1960 年的 56.5% 下降到 1998 年的 42%^①，2013 年为 29.2%。^② 由此可见，直到 2012~2013 年，埃及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仅为埃及国内平均生产率的 50%，如此低的农业生产率严重制约埃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导致埃及农业部门劳动力居高不下。人口普查显示，埃及农业劳动力从 1960 年的 440 万增至 1998 年 899.3 万，^③2013 年稳定在 806 万左右。^④ 埃及农业盛行佃农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缓慢；农业产值增长主要依靠种植经济作物，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业生产的低效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难以离开土地。2010 年埃及劳动力调查显示，农业部门中仅有 2.7% 的劳工参加了国内移民。^⑤

（二）过度城市化

大工业生产要求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高度集聚，因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差距，决定城市工资收入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依据托塔罗的学说，城市更高的收入预期驱动农村劳工移民城市。埃及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快了国内劳工流动的速率和规模，但收入预期也受到城市失业率等因素影响。埃及城市过度发展，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的超大城市化问题突出，造成埃及城市失业率高企，打击了劳工参加国内移民的积极性。1988 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埃及城市省份失业率每增加 1%，就会导致农村移民城市的劳工减少 1.6%。^⑥ 更重要的是，大量埃及农村劳工最终进入城市棚户区和非正规就业部门，导致劳工向上的社会流动困难。

埃及长期推行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优先发展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和苏伊士等下埃及主要城市。1996 年，埃及共有 16 个工业园区，9 个位于大开罗，其产出占埃及制造业产值的 57.2%；另有 4 个位于亚历山大，其产出占埃及制造业产值的 22.5%。^⑦ 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加重了埃及城乡发展的失衡，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2005 年的调查显示，最富有的 1% 埃及人中有 93% 居住在城市；最富有的 10% 的

①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 A Labour Market Approach*, p. 31.

② “Egypt,” The World Factbook, CI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eg.html>，登录时间：2017 年 4 月 10 日。

③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Egypt: Conventional Problems, Unconventional Remedies,”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2002, p. 20. <http://www.mafhoum.com/press4/117E13.pdf>，登录时间：2017 年 10 月 9 日。

④ “Egypt”.

⑤ Santiago Herrera and Karim Badr, *Internal Migration in Egypt: Levels, Determinants, Wages, and Likelihood of Employment*, p. 15.

⑥ Khalid I. Aldakhi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Arab Countries: The Case of Egypt*, p. 9.

⑦ The World Bank, *Arab Republic of Egypt Urban Sector Update*, p. 15.

埃及人有 81% 居住在城市。^① 同时,埃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城市更高的预期收入吸引大量上埃及的农村劳工特别是年轻农村劳工移民城市。

城市人口比率的上升是城市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大量农村劳工移民城市,推动了埃及城市人口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埃及城市化的发展。埃及的城市化率从 1947 年的 34% 增长到 1966 年的 40%,1976 年又继续增至 44%,直到 1996~2006 年间稳定在 42.6% 左右。^② 埃及官方城市分类包含三种类型:城市省份,仅限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和苏伊士四省;拥有市政机构的城市;农村地区和农村省份的省会。有学者尝试将埃及城市重新界定为人口规模 1 000 以上的聚居地,根据这一划分标准,1996 年埃及的城市化率达 66.8%,2006 年达 67.5%。^③ 相对人口自然增长,国内移民在埃及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1960 年间国内移民占埃及城市人口增长的 26.9%,1960~1966 年间上升到 38.6%,1966~1977 年间达 40.7%。^④ 但过多劳工移民涌入开罗、亚历山大等大城市,导致埃及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过度城市化问题越来越突出。

过度城市化是指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因而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比是衡量埃及过度城市化问题的有效指标。纳赛尔时期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并没有实现埃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期过度城市化问题更为严重。1980~2000 年间工业产值占埃及总产值三分之一左右,^⑤ 同期埃及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40%。在工业化进程中,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基本同步的。有研究表明,英国 1841~1931 年间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为 0.985,法国 1866~1946 年间为 0.970,瑞典 1870~1940 年间为 0.976。^⑥ 从劳动力配置角度看,埃及城市化超前工业化趋势更加明显。2015 年埃及的城市化率已达到 43.1%,但 2013 年埃及工业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率相同,仅为 23.5%,而服务业占比达 47.3%。^⑦ 1865~1895 年间,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法国、瑞典、瑞士的城市化率介于 11%~13%,工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率分别达到 29%、22% 和 45%。^⑧

超大城市化是埃及过度城市化问题的集中体现,也是阻碍劳工移民个体向上社会流动实现的重要原因。埃及城市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都集

① Paolo Verme, Branko Milanovic and Sherine Al-Shawarby et al., *Inside Inequality in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Facts and Perceptions across People, Time, and Space*,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4, p. 41.

② The World Bank, *Arab Republic of Egypt Urban Sector Update*, p. 8.

③ Ibid.

④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p. 93.

⑤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 p. 88.

⑥ 郑秉文主编《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第 29 页。

⑦ “Egypt”.

⑧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9 页。

中在首都开罗、亚历山大两个大城市,中小城市发展缓慢。大开罗地区的人口是埃及最大二线城市塞得港的 25 倍。^① 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导致城市失业率高企。2014~2015 年,埃及全国失业率为 12.7%,其中城市失业率达 14.9%,农村失业率达 11%。^② 大开罗地区作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失业问题更为严重。2007 年的调查显示,1998~2006 年间全国失业率从 11.7% 下降到 7.8%,其中大开罗地区是唯一一个失业率没有下降的地区。1998~2006 年间,大开罗地区失业率从 9.0% 上升到 9.3%。^③ 开罗、亚历山大是埃及农村劳工的主要移民目的地。因此,劳工移民也成为埃及超大城市化的主要受害者。劳工移民与开罗本地劳工相比处于弱势,他们面临更加严峻的失业压力。

(三) 人力资源与家庭因素

劳工移民的教育状况与家庭背景,亦是造成其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

家庭收入多元化是埃及农村贫困家庭劳工移民城市的重要推动力,然而恰恰是农村家庭贫困,使其缺少劳工移民实现个人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土地是农村家庭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居住在开罗的上埃及农村劳工中有 58.7% 没有土地,24% 拥有 1 费丹(1 费丹约合 6.3 市亩)以下的土地,11.6% 拥有 1~2 费丹土地,剩余 5.8% 拥有 2~3 费丹。^④ 埃及农村底层家庭为缓解家庭贫困,往往通过协商派男性家庭成员移民城市,以便获得更高的家庭收入。2010 年的社会调查显示,国内劳工移民比农村劳工的平均工资收入高 4.7%。^⑤ 但贫寒的家庭背景难以给劳工移民提供资金、技术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劳工移民进入城市后大多只能进入非正式就业部门,限制了收入的提高。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埃及多数时期通货膨胀高企,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很多埃及贫困家庭转而选择重新进行农业生产,减少家庭食物支出,缓解经济压力。

埃及国内劳工移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妨碍他们获得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收入,最终导致劳工移民社会地位难以提升。教育水平深刻影响着劳工的移民选择。回归性分析显示,劳工的教育水平比目的地高的时候,无论是前往农村和城市的可能性都是正相关的。^⑥ 但实际上,在参加埃及国内移民的劳工中,文盲和中专毕业生的

① The World Bank, *Arab Republic of Egypt Urban Sector Update*, p. 13.

② Central Bank of Egypt, *Annual Report 2014/2015*, p. 55.

③ Ragui Assaad, *Labor Supply,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Egyptian Economy, 1998–2006," Working Paper*, No. 0701, 2009, p. 27.

④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2002, p. 156.

⑤ Santiago Herrera and Karim Badr, *Internal Migration in Egypt: Levels, Determinants, Wages, and Likelihood of Employment*, p. 10.

⑥ Khalid I. Aldakhi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Arab Countries: The Case of Egypt*, p. 9.

数量最多。2000 年对上埃及在开罗的劳工调查显示,文盲或接受过中专教育的劳工是国内劳工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分别占 45.9% 和 35.5%。^① 其中埃及年轻劳工移民中接受过中专教育的人数逐渐增多。数据显示 2000 年参加国内移民的年轻劳工中接受过中专教育的比例较年长劳工高,20~24 岁中有 54.7% 接受过中专教育,25~29 岁中有 23.3%,但 30 岁以上中有 59.5% 是文盲。^② 埃及中专教育由于扩张过快,教育质量低,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文盲或仅接受过中专教育的埃及劳工难以适应城市的现代部门,只能在城市非正式就业部门谋生,收入微薄,甚至低于非劳工移民。2010 年的社会调查显示,文盲和中专劳工移民的收入均低于非劳工移民,文盲和中专教育程度的劳工移民年均收入分别为 853 埃镑和 976 埃镑,非劳工移民分别为 953 埃镑和 990 埃镑。^③

职业技能培训缺乏是劳工移民向高级技术岗位流动的又一不利因素。大多数埃及农村劳工缺少专业技能。调查显示 94% 的上埃及农村劳工没有专业技术,只有 5.8% 的劳工拥有经商等职业技能。^④ 由于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小部分掌握专业技能的劳工也往往难以适应城市工作环境与生活节奏。因此,农村劳工进入城市后,企业的职业技能培训成为劳工移民获得稳定职业,并向中高级技工转变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一些埃及企业开始向劳工提供职业培训。2008 年的世界企业调查显示,22% 的埃及企业提供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高于中东地区 10% 的平均水平。^⑤ 但埃及中小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远低于大企业,100 人规模以上的企业中 33% 提供职业培训,5~19 人规模的小企业中只有 13%。^⑥ 非正规就业部门则基本不提供职业劳工培训,而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部门恰恰是埃及农村劳工的主要就业选择。本身缺少技能的劳工移民又难以获得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只能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职业地位提升无异于“水月镜花”。

四、结语

国内劳工移民是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及国内劳工移民规模庞大,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劳工移民逐渐陷入困境。当代埃及劳工移民对劳工个体和埃及社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①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p. 113.

② Ibid., p. 115.

③ Santiago Herrera and Karim Badr, *Internal Migration in Egypt: Levels, Determinants, Wages, and Likelihood of Employment*, p. 10.

④ Ayman Zohry, *Unskilled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from Upper Egypt to Cairo*, p. 13.

⑤ José-Luis Álvarez-Galván, *A Skills beyond School Review of Egypt*, Paris: OECD Publishing, p. 54.

⑥ Ibid., p. 54.

从个人层面来看，规模庞大的早期埃及劳工通过国内移民成功地改变了自身命运，缓解了家庭贫困。然而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大部分埃及农村劳工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职业地位和财产收入难以提高。他们只能集聚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城市边缘地区，对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怨声载道，再加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蛊惑，政治暴力事件频繁爆发，威胁社会稳定。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方面，埃及劳工移民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了农村地区的失业问题。^①不过从穆巴拉克执政开始，国内劳工移民增长陷入停滞，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业部门，埃及人口红利难以完全释放。劳工移民进入城市后，又难以接受必需的职业技能培训。2013 年，埃及的人力资源指数仅为 0.662，排在世界第 112 位。^②另一方面，埃及人口的城乡迁移的确实现了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有力地支撑了埃及工业化的发展。但由于各种资源过度偏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区域经济和城乡发展失衡，因而劳工移民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给开罗的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加剧了埃及过度城市化问题。与此同时，沙漠新城又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支撑其发展。1996~2006 年间，埃及的新城仅吸收了埃及新增人口的 4.3%。^③

展望未来，埃及摆脱国内劳工移民困境的关键依然是如何突破工业化瓶颈。国际发展经验表明，成功推进适合本国国情与发展道路的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大规模地创造就业机会的必由之路。历史经验表明，像埃及这样的人口大国，绝不可能依靠地租性经济实现经济腾飞，内生性动力支撑的工业化才能托起埃及强国富民的复兴梦。塞西执政以来，埃及政局逐渐趋于稳定，推进令人振奋的“振兴计划”。塞西政权大刀阔斧地进行财税金融改革，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超大型项目如新首都、苏伊士运河经济走廊计划方面不时有惊人之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以塞西总统为首的埃及执政精英在改革与发展上决心很大，但面临的矛盾、困难和掣肘不可小觑。在埃及决心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进程中，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埃及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全面推进，为中埃两国优势互补、扎实推进产能合作提供了崭新的平台。埃及可直接利用中国充裕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结构，加速工业化进程，持续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中埃两国双赢的过程，亦有助于埃及国内劳工移民走出困境。

(责任编辑：邹志强)

^① Santiago Herrera and Karim Badr, *Internal Migration in Egypt: Levels, Determinants, Wages, and Likelihood of Employment*, p. 22.

^②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 p. 143.

^③ The World Bank, *Arab Republic of Egypt Urban Sector Update*, p. 12.